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法国汉学研究丛书

FAGUO HANXUE

YANJIU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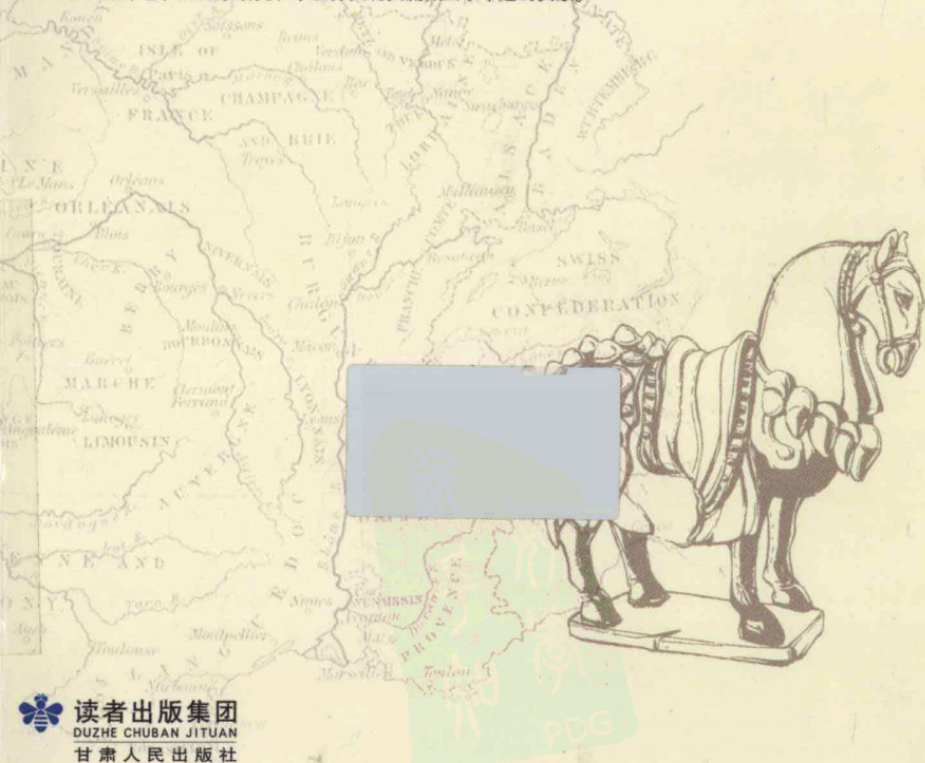
郑炳林 主编 / 耿昇 译

法国西域史学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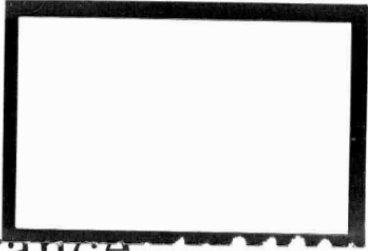
ESSENCE OF FRANCE

XIYU HISTORY STUDIES

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被西方泛归为汉学范畴。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研究执牛耳者，法国学者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汉学研究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Essence of France

Xiyu History Studies

法 国
西域史学精粹

郑炳林 主编 / 耿 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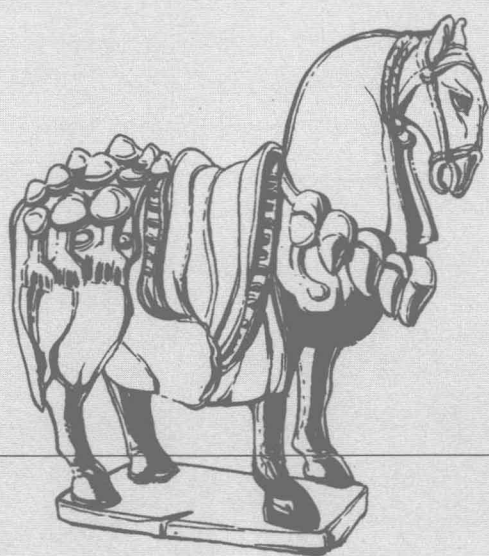
③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录

汉代丝绸贸易考	何四维(743)
天马与龙涎	布尔努娃(758)
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布尔努娃(782)
彼得大帝与西域的黄金	布尔努娃(801)
约翰长老传说在丝路上的传播	B.于格 E.于格 (847)
远东和高地亚洲的住宅、社会及人类集团	石泰安(871)
中世纪中国和西域的亚美尼亚人	多维耶(903)
匈奴人与匈奴人	韩百诗(924)
室韦人是蒙古人吗?	保罗·拉切夫斯基(940)
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	石泰安(973)
中国佛教中的占卜、游戏和清静	郭丽英(1066)
静坐仪,宗教与哲学	谢和耐(1093)



汉代丝绸贸易考

何四维 (A.F.P.Hulsewe)

L·布尔努娃 (Boulnois) 夫人于 1963 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与西方进行丝绸贸易历史的通俗性读物《丝绸之路》。我在这里只想对这种贸易的某些方面加以澄清。这些方面过去曾有所忽略，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甚至是错误的方式被作过解释。

我就从各个相距遥远的集团之间的物资交流这个问题开始论述，这一问题是对史前所有假设中的一部分。首先是费尔塞维斯 (Fairservis) 先生的著作，他在 1959 年于纽约出版了《论东方文明之起源》一书。我们暂且不谈有关青铜器技术传播这一棘手问题，我觉得一切迹象似乎都说明，中国中原汉人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得到了西突厥斯坦的玉器。H.S.汉斯福德 (Hansford) 于 1958 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的玉器雕刻品》一书中作了解释。中国的许多特产也肯定传向了西方。在汉朝军队打通西域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丝绸就已经进入了距离其出产地有几千公里之遥的西域了。E.迪特里希 (Dittrich) 于 1963 年在西德威斯巴登市出版的《亚洲研究》杂志第 13 卷中，发表了《中国古代有关斗兽戏内容的艺术》一文，文中对前人的观点，尤其是对俄国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高度概括性的总结。我们还可以参阅 K·耶特马尔 (Jettmar) 于 1964 年发表的《早期的草原居民，欧亚大陆的畜牧业生产及其背景》；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于 1941 年在《远东博物馆学报》第 13 卷中发表的《淮水和汉水》；杨联陞于 1953



年在《通报》第42卷中发表的《论在西伯利亚发现的带有铭文的中国汉代镜子》；日本梅原末治和江上波夫也有这方面的论著。还必须补充说明，我们至今尚不知道丝绸最早是如何传入西方的，今后可能会发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对于公元前最后几十年的情况，我们所了解的东西比较多一些。G.戈岱司（Coedès）所积累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资料说明，当时的“赛里斯国”丝绸之国是一种很著名的产品，它以相当大的数量从东方涌向西方市场。

很明显，中国丝绸突然出现在西方，是由于汉朝开拓西域的结果，这种征服促进了国际贸易。因为古代的作家们就已经谈到了赴远东冒险的西方商人，所以在好几部近代著作中，竟误认为丝绸是汉族商人的出口物品；甚至还有人认为，汉朝向西域扩张本身就是扩大市场的结果。

据我所知，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汉人向西方扩张的动机，另一方面是研究中国丝绸传到西方的方式问题，而且我仅限于论述中国在汉代向西域扩张的问题。

为了解释中国汉代向西域地区的扩张，现在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必须采取防卫措施，以抵御匈奴人的入侵，这种看法今天似乎已经过时了。另外一种理论则比较近代一些，也比较成熟一些。它认为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之后，就变得很强大起来了，这个年轻的和朝气蓬勃的民族，试图向附近弱小的或不发达民族地区进行扩张。后一种理论包含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它认为那时刚刚获得统一的中国，在经济方面战胜和克服了许多内部困难，从此之后也需要冲破国内市场的局限，而去寻求国外市场了。

那种突出商人的重要作用的理论，即认为中国汉代向西域地区的扩张，纯粹是出于经济动机的观点，主要是由安作璋传播的，他于1959年在山东济南出版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一书；钱穆在其1957年于香港出版的《秦汉史》中，也持这种观点。

周谷城持另外一种不太过激的立场，他把汉朝军事扩张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商人们所施加的压力，其详细观点见其于1937—1947年间先后多次于上海重版的《中国通史》；陈竺同于1957年在上海出版的《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何兹全于1959年在上海出版的《秦汉史略》等书也持这种观点。无论是著名的秦汉史学家劳榦于1952年在台北出版的《秦汉史》，还是吕思勉在长篇史书《秦汉史》，或范文澜于1958年在著名的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简编》的新版本中，都没有以任何方式论及汉代对外扩张的动机问题。张维华于1957年于上海出版的《论汉武帝》一书中认为，匈奴人是一种贪婪的、蒙昧的胡族人，他们经常不断的入侵中原引起了中国大众日益增长的愤慨，作者在承认汉朝于占领西域之前，削弱匈奴势力的军事行动必要性的同时，却又认为“当时国内发展着的商业和贸易，在客观上也要求打通西域这条通道”。鲁唯一（Loewe）于1961年在伦敦中国学会出版的《论汉代的军事征服》一书中，也采纳了这种认为汉代对外扩张的动机，主要是由于恢复经济和在国外开辟市场的压力，而造成的说法。李原澄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秦汉史大纲》，李剑农在1957年出版的经济史著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也持这种看法。李剑农还特别指出，在打通西域地区之后，贸易关系的发展也是很缓慢的，无论汉军开拓西部地区，还是向西南地区扩张，其目的都不是为了贸易，尽管这些军事行动也间接地促进了贸易事业的发展。

我们在以近代观点从政治上进行诠释时，汉王朝必须看到为抵抗匈奴人而采取军事行动是完全必要的；那种从经济方面所作的诠释，却认为抗击西部和西北部游牧部落的军事行动，只具有比较次要的地位。

我们应该千万注意，不要轻易地概括归纳。芮沃寿（Arthur Wright）于1963年在芝加哥出版的《论历史著作中的归纳法》的文集中，发表了《在中国史研究中如何使用归纳法》一文，他和



卜德 (Derk Bodde) 先生一样，都一方面指出了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盲目使用概括归纳法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不要把从西方史料中引来的归纳法运用于中国史学，尤其是在使用一些理论术语时更为如此，不要为中国史的发展乱贴标签。我认为，汉朝向西域拓展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用古人的话来说就叫作“断其右臂”，即夺取匈奴人在西部地区的基地。沙畹于 1920 年在《中亚十铭文》中论述了此问题。

我在本文中继续使用汉文史料用的“匈奴”二字，他们是否就是西方史料中的“Huns”人呢？这一点现在仍在争论，尚未形成定论。马恩森—赫尔芬 (Maenchen-Helfen) 曾于 1959 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献给高本汉先生的汉学论文集》中发表了《“Huns”民族名称考》一文，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于 1951 年在美国地理学会出版了《亚洲腹地的中国边境》，书中认为匈奴长期入侵中原本身，就是一种缓慢发展结果。上古时代的中国中原农民为了开拓可耕地，就毫不留情地把原来的原住民驱逐到那些年降雨量不足 50 毫米的不毛之地，那里根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民族最后只好采取了游牧生活方式。中国的这种变化发生在公元前 4 世纪左右，我们从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修建万里长城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于公元前 215 年命令蒙恬扫平鄂尔多斯，并把秦国陇西地区的领土同新近开拓的北部居延地区连成了一片。这种使定居民族与由他们所取代的那些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了。秦代的全部疆域以新长城为界，这就把包括黄河套地区在内的领土，全都变成了大秦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正如拉铁摩尔继司马迁和班固之后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样的征服才促使匈奴部族统一起来了，随之又引起了匈奴对中国中原汉族地区的入侵。万里长城（更确切地说应是几十万戍边军士）在一定阶段是可以阻止匈奴入侵的。但一旦国内爆发内乱时，那些强行征募的兵勇与被迫迁来的百姓，都会立即擅离职

守，匈奴人也会蜂拥而至，重返他们原来被驱逐的地方。这样就又恢复了旧局面，但不同的是占领者已不再是孤立的部落，而是由头曼和冒顿单于创建的新匈奴国家了。

匈奴人这种大规模的入侵，一直持续了 70 多年。汉朝除了遭受人员生命方面的损失和物质方面的破坏之外，最难以忍受的还是他们必须向匈奴人纳贡，尽管汉文史料从来也不使用这一丢人现眼的字眼，仅仅称之为赠赐。

这种贡品可能就是丝绸贸易的起因之一，因为很大一部分贡品就是丝绸。汉高祖于公元前 201 年首次试图与匈奴和解时，他答应把汉王室的一名公主下嫁给匈奴单于为妻，他还许诺每年奉送包括粮食和美酒、丝绸和丝絮在内的礼品，全部礼品的数字是固定的，即“有数”的。公元前 179 年汉文帝登基时又延长了这项条约，并于公元前 174 年致书匈奴单于求和，同时也特意送去了许多马匹、丝绸和锦缎等礼品。汉文帝又把一位所谓“公主”下嫁匈奴单于为妻，于公元前 162 年再次求和。他还抱怨说，尽管汉朝每年都奉赐小麦、黄金、锦缎和丝絮等礼品，但匈奴人还是不断入侵。汉景帝维持了旧条约，也送去了厚礼和一位汉族女子。汉武帝也延长了这项条约，并答应奉送其他礼品。汉武帝继续其前任的作法，设立了边界互市，并保证充分供应商品。公元前 133 年，在马邑战役前夕，汉武帝又重新送去了一位“公主”和一份慷慨的厚礼，其中也包括黄金、丝绸和锦缎。德效骞（H. H. Dubs）在 3 卷本的《西汉史》中，翻译了《汉书·表》中的这类资料；J. J. M. 格罗特（Groot）在《有关亚洲史的汉文文献》中也翻译了其中的某些，这本书于 1921—1926 年在柏林—莱比锡出版。

为什么汉朝会如此驯服地长期忍受匈奴人的入侵，而又不采取积极行动以击退他们呢？为什么他们在稍后几年中才敢于采取反击措施呢？这是由汉朝国内的政治局势所决定的。

一直到汉武帝时，中国有还有三分之二的领土，没有直接被



置于汉帝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是在诸侯国主们的统治之下，他们拥有范围很广的自治权力。我于 1962 年在柏林出版的《世界史入门》杂志第 2 卷中，发表了《中国古代史》一文，内附一张中国汉代地图。大家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梗概。关于封建诸侯国主的权力及其衰退情况，镰田重雄于 1962 年在东京学术振兴会出版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一书中讲得很透彻。这些封建诸侯国的王廷成了汉帝国皇宫的陪衬，诸侯国君有权任命国内除宰相之外的全部行政人员。公元前 154 年爆发的大叛乱证明，这些诸侯国君对汉朝中央政权并不是很忠诚的。尽管汉朝政府所取得的迅速和全面的胜利，使中央政府有了采取行动的可能。但只是在公元前 145 年之后，中央政府才下决心彻底废除这些国君们的行政权。从此，这些国君们真正变成懒人国里的国王了，其权力仅限于得到其国内的一部分固定税收，而行政管理权却委托给了皇帝的钦差命官。最后铲除封建国君和贵族权力，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尽管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采取了某些不彻底的措施，但这些诸侯国的领土仍完整无缺，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压缩这些封建诸侯国的领土。公元前 127 年春天，汉武帝允许封建国君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把诸侯封邑转给他们各自的儿子。这样，封建国君们的领地封邑就变得可以买卖和转让了。德效骞的《西汉史》第 2 卷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汉帝国在没有排除这些封建诸侯国从背后攻击的威胁之前，它无法对匈奴采取行动，因为匈奴处于北部和西北部；而那些封建诸侯国又处于东部和东南部。这就使汉朝在公元前 145 年之前，丝毫无能为力。只是到了公元前 127 年左右，它才有了采取行动的可能。汉人在公元前 133 年马邑战役中，第一次采取了攻势，但这些行动仍仅局限在汉王朝领土上。公元前 130 年，汉朝加强了雁门都尉府的戍边；公元前 129 年，四员汉将各率一万名骑兵在边境市场发动了对匈奴的袭击。G.哈隆（Haloun）在 1926 年于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 91 卷中，发表的《月氏考》一文

中谈到了该问题。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就是在与匈奴为敌的胡族中寻找盟友，这也清楚地说明汉人还不能单独地对付匈奴人。汉王朝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反击，以征服鄂尔多斯而告结束，建立了朔方和五原都尉府以巩固其征服成果，并且还强迫 10 万居民迁徙到那里去。从公元前 127 年开始，汉王朝一直保持着主动权，在卫青和霍去病远征之后，占领了甘肃走廊的东部地区，其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浑邪王的屈服而造成的。只是在公元前 111 年，汉人才第一次控制了甘肃省的狭长地带并向沙漠边缘的敦煌地区移民。汉军对西域的远征就是从这里兴师的，这里由修筑着强大防御工事的玉门关和阳关保护着。汉朝于公元前 109 年平定了楼兰，104—102 年平定了大宛。虽然汉朝在他们乐意的时候，几乎随时都可以横穿西域，但长期以来，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是不稳定的。沙漠绿洲的小王国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匈奴人也一直在这一地区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汉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是以公元前 60 年平定吐鲁番绿洲开始的，这里是匈奴的基地和进入天山走廊的屏障。汉人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具体表现在公元前 60 年任命西域都护府都护一举。

尽管匈奴也有过衰弱的时代，但它始终是汉朝的威胁。郅支于公元前 36 年的突然出现，又增加了新的恐惧。匈奴的威胁成了汉朝从公元前 73 年到公元 2 世纪长期征战的原因。

我认为，汉朝反击匈奴战争的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动机，就是要阻止匈奴人的不断入侵。尽管这场战争也使汉朝征服了某些领土，但征服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切断匈奴人的给养供应。因为匈奴人的后勤基地是甘肃走廊、西域绿洲和南满等地。汉人朝思暮想的就是从其毗邻地区，排除匈奴人经常性的军事威胁。

那种坚持认为引起西域内附汉朝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是丝绸贸易的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的原因之一是随意进行归纳概括。芮沃寿和卜德曾及时地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因此，汉朝



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同外界做生意，而且也能够把他们的希望变成事实，即他们拥有这样做的能力。

对渴望追求利润的汉族商人的这种看法，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一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其二是由于同西方近代史相比较而产生的结果。正如某些大型果品企业公司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小共和国引起了革命，某些石油公司在中东煽起了战争一样，人们有意无意地也把这种现象运用到了公元前 2 世纪的中国。司马迁和班固曾大量描述过在汉朝边境从事贸易的人，他们引证了大批皇帝诏令和史料，曾大声疾呼要人们注意，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吸引力而导致农业萧条的现象。尽管司马迁在列举每年都确保有两万钱收入的职业时，也提到了桑田、生丝和丝织品，但丝毫没有谈到对外贸易，甚至也没有提到边境市场，而是罗列了一长串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的名称。根据 L.斯旺（Swann）的《中国的粮食和货币》一文认为，边境贸易确实是存在的，汉武帝还为其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市场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不许出口器皿和兵器，尤其是弓弩、小岁口的高头大马等。汉朝还明文规定禁止随便与“胡族”进行贸易，违者要处以极刑。李剑农曾正确地指出，当时只有限制而没有鼓励。他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为，在“封建”时期就已经买卖和运送某些产品了。公元前 323 年，在向鄂君启发证书时，一方面允许他在楚国的某些地区通过水陆交通进行贸易，但明文规定“毋载金革弮箭”。商承祚、郭沫若和殷涤非也持这种观点。所有那些主张从经济方面解释汉朝对外开拓的原因的作家都深受以下史料的影响：司马迁曾对汉朝向西域地区派遣十几个使节的作法，满腹牢骚，使节团的许多成员实际上成了伪装成使节的商客。这些人完全由政府供应，他们不是自负盈亏的商人，而是利用国家的财产使自己大发横财；他们卖出去的是国家的货物，而赚来的钱却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有许多事实，可以驳倒那种认为富商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

式，促进了汉朝对外开拓的观点。汉武帝的中央政府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摧毁豪族，即大地主和大商人们的权力。早在公元前 128 年，汉武帝就着手限制豪族在帝国政权中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原来根据他们的纳税率而有权进入政界，汉武帝命令每个都尉府，每年都要为帝国的官吏队伍保举两人，而不要考虑其经济地位。不久之后，豪族由缗算法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缗算是根据财产、库存货品以及资本多寡而纳税。因为战争使国库空虚了，需要由富翁们来填补。《盐铁论》中的许多段落都讲到了汉武帝的扩张开拓政策；另外一些段落中也讲了富有阶级的代表——文士们对这种政策的猛烈攻击，他们都希望维持和平局面。这次经济大会是于公元前 81 年举行的，其中只有一个人颂扬了汉朝的丝绸出口政策。盖尔（Cale）于 1931 年在荷兰莱顿翻译和出版了《盐铁论》全文。

所有这一切只会使我们得出唯一的一个结论，即最关心丝绸的是汉朝政府。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汉朝政府也参与了丝绸贸易。但在汉朝的初期以及晚期的某些时候，王朝政府参与了丝绸交换。两部汉朝断代史的许多段落，都指出汉朝曾定期向匈奴赠送各种丝绸，这就他们的贡品。崔瑞德（Twitchett）于其 1963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唐代的财政管理》一书中，也曾讲到这一情况。余英时于 1964 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对该书作过书评。

我尚不清楚汉高祖每年答应奉送给匈奴丝绸的数量。公元前 174 年，除了其他许多礼品之外，汉文帝还送去了绣 14、锦 14，赤绋、绿缯各 44。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礼品，全部贡品的数量仍不为人所知。无论如何，其数量也是很大的，因为贾谊也曾对此颇有怨言。

尽管我不知道其具体数字，但我从许多史料中便可以看出，自汉高祖以来，即从公元前 200 年到汉武帝即位初的 70 多年间，汉王朝从未中断过纳贡。公元前 51 年，当内附了汉朝的南匈奴



首领来到长安宫廷时，除了得到其他豪华的私人礼品之外，他还得到了杂帛 8000 匹，絮 6000 斤；他两年后再次来到长安，又得到了同样的赠礼，外加锦帛 9000 匹，絮 8000 匹；当他于公元前 33 年第 3 次赴长安时，汉朝所赠之礼品已经倍增。因此，西汉在多年前就开始向匈奴供应大量丝绸了。

我对东汉的情况知道得稍微多一些。在公元 30—34 年间，东汉的使节们为匈奴人带去了数量不详的黄金和丝织品。公元 50 年，南匈奴不但从北地都尉府获得了领土，而且也满载厚礼而归。我可以举出其中最主要的几种礼品：1 万匹丝绸、30 万升大米。同一年所达成的一条默契更能说明问题，它要求东汉政府每年都必须把 1 千匹彩缯作为个人礼物送给匈奴单于，把 1 万匹彩缯送给他的宫廷。除了每年奉送的这些礼品之外，在每个新匈奴单于即位时，汉朝必须送去 4000 匹花丝绸。据公元 85 年的史料记载，当时匈奴人已经享受了 40 年的赠礼。公元 91 年的一个故事说明，汉朝每年要向南匈奴提供价值 1.9 亿钱的货物，向西域的专制君主们提供约为 7480 万钱的货物。甚至在公元 143 年这样晚的文献中，还记载了各种礼物，包括 2000 匹丝绸和绢，还有一批数字不太具体的锦缎。

汉朝还要向北部和西北部边陲的其他游牧部落运输大量丝绸，如向鲜卑和乌桓纳贡丝绸以阻止他们的入侵。我只发现了一个数字，但它却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从公元 58 年开始，汉人每年要向鲜卑族交纳约合 2.7 亿钱的物品，而且还要送礼；除了送给匈奴首领的礼品外，还要向西域绿洲小王国的国君们送礼。公元 91 的一个故事也提到，东汉每年对西域的贡品高达 7400 万钱。例如，当公元 120 年，两个鲜卑首领带领他们的部落臣服汉朝时，他们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彩缯和普通丝绸的赠品。在东汉时期，汉人曾先后十几次借用游牧民族的兵员，以对抗匈奴、鲜卑和乌桓族的入侵，每次都要以厚礼相酬。可以肯定，每次兵饷的报酬不是用现钱，而是用实物支付的，在当时来说主要就是用丝

绸支付。这就使相当数量的汉朝丝绸流向了国境之外。洪廷彦于1958年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第3期中，发表的《两汉三国的夷兵》一文中讲了这一问题。

匈奴首领及其贵族、鲜卑和其他部落的首领与西域绿洲的小国王们一样，他们肯定都把汉朝送去的部分丝绸，用于裁制华丽的服装；科兹洛夫于20世纪初在蒙古的诺音乌拉，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统治阶级还没有荒诞到按照汉朝叛臣中行说175年的建议，穿上丝绸衣裳去狩猎、放牧或征战。这就是匈奴和其他部落以及沙漠绿洲的王国，肯定会存有相当数量的丝织物和丝絮，他们又以此与位于西部更遥远地区的部落进行交换或贸易。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考古记》第3卷（1928年牛津大学版），日本梅原末治于1960年在东京东洋文库出版的《对在蒙古诺音乌拉发掘的遗物的研究》中都论述了这一问题。

西域各部族一开始接触丝绸，就表现出了强烈的贪婪性。《汉书补注》卷96（格罗特的《中国文献》第2卷译本）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匈奴人的代表在西域一直受到优待，而汉朝的使节对任何一点小东西都必须用丝绸来支付，尤其在大宛更为如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丝绸运到了匈奴和西域其他地区了，而且外运丝绸的是汉朝政府而不是商人。汉帝国政府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丝绸呢？一些其他迹象也说明汉朝政府拥有大量的库存品。所以，当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胜利向北挺进时，他犒劳戍边将帅，共分赐了多达100万匹的丝绸。同一年，仅一个“均输”组织的仓库里，就储存500万匹丝绸，价值500万两黄金。

公元前110年前后，这批丝绸货可能是由于大量没收大地主和富商财产的结果，当这些人企图偷漏繁重的财产税（缗算）时被没收了财产。当时的赋税或人头税必须用实物交纳；土地税——在正常情况下相当于所收获粮食的三十分之一——至少有



一部分是用丝绸来缴纳的；如果考虑到其他一般本应用货币来支付的税收，也可以用农产品来缴纳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是完全可能的。东汉时代出现了一种用实物缴纳一切税收的倾向，特别是用丝绸来缴纳的倾向。公元 85 年左右，曾有人奏请批准用实物缴纳除农业税之外的全部税收，但这一提议被拒绝了。事实上，许多税赋杂捐都是用丝绸支付的。汉朝政府就这样囤积了大量丝绸，而且还要奉送北部和西北部的诸胡族，以谋求和平与和睦相处，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物质方面的好处。丝绸是由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由自由商人运出国境去的。由于汉朝不断向番酋和国主纳贡、付军饷或送礼，使西域积累了相当多的丝绸。由此可见，对外贸易（主要是丝绸贸易）从来也不是汉帝国向西域扩张的主要动机。拉铁摩尔在他于 1951 年发表的《在亚洲腹地的中国边境》一书中曾指出：“人们不能用中国丝绸产量的百分比，来计算作为贸易商品中的丝绸数量，因为中国所生产的丝绸可以在从西域、近东到罗马的沿途市场上倾销。贵重的丝绸还可以作为送给西域的小国王和贵族们的礼品或贡品，也可以作为经纪人在大笔生意中的酬金。这种交易主要是靠边境地区的经纪人进行的，而并不取决于中国国内的丝绸产量。”拉铁摩尔后来于 1955 年在第 10 届国际史学大会的报告中，在 1962 年于伦敦出版的《边界史研究》中，都曾重复这一问题。拉铁摩尔也曾提到他在蒙古地区旅行时的亲身经历。他从当代的经验出发进行推论，使用把 20 世纪的现象推移到汉代的办法，进行归纳总结。

西域确实有过汉族商人，尽管有关史料少得可怜。我们西方的史料对“赛里斯国”商人也有所记载。但“赛里斯国”这一名称包括许多民族，普林尼（Pliny）说他们是蓝眼睛、红头发、身材魁梧的人；《厄利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都认为他们是身材矮小的蒙古族蒙昧人，所以说西方从来也没有记载过真正的汉人。《史记》和《汉书》的作者们也提到，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 215 年左右），曾有汉族商人向胡酋赠送丝织品，并且得到了